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58

2008年8月20日

\*\*\*\*\*

## 國家安全的新情況與新問題

軍事科學院 張世平少將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比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站在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的高度……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要“提高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前幾年，胡錦濤總書記還提出了“三個提供、一個發揮”的歷史使命。這些新思想，是對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新認識，是對國家武裝力量職能的新概括，是對國防和軍隊建設在國家總體佈局中戰略位置的新定位，是戰略思維的新轉變。

### 第一，國家安全形勢面臨諸多新情況

對於國家安全形勢到底怎麼看，是戰略決策的邏輯起點。俗話說，“看明白了，才能整明白”。而“怎麼看”，有一個“思

想的前提”或者叫“理論基礎”的問題。

由於歷史的原因，一百多年來一方面我們總挨打，一方面又長期處於內亂不已的狀態，因此在戰略思維上我們形成了兩個痼疾，一個是對外總是擔心“狼來了”，一個是對內總擔心工農學兵暴動和政變等內亂爆發，“時刻警惕著”。尤其是對外來侵略，我們有特殊的敏感，總擔心誰“亡我之心不死”。這也難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先是英國人打我們，後來是八國聯軍打我們、日本人打我們。僅從1840~1905年的65年間，西方列強就對中國發動了上百次侵略，中國被迫簽訂了745個不平等條約。新中國剛成立，美國人又把戰火燒到我們的家門口，1962年印度在喜馬拉雅山東西兩邊打我們，1969年蘇聯在東北的珍寶島、新疆的鐵列克提打我們，1975年南越在西沙群島打我們，1979年越南在中越邊境打我們，“兩山作戰”一直打到80年代中後期。90年代末，美國人又把我們的駐外大使館給炸了。

今天，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國際情況而言，按照“企圖+能力=威脅”的原理進行具體分析可見，全球192個國家中，對於中國能夠構成安全威脅的只有美國、俄羅斯、歐盟、日本、印度、巴西等少數幾個大國。但除了美國外，它們大多或者沒有“企圖”，或者沒有“能力”。從周邊看，陸路接壤的14個國家——俄羅斯、蒙古、朝鮮、越南、老撾、緬甸、印度、尼泊爾、不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雖然有的有賊心但沒有賊本事，大多數既沒有賊心也沒有賊本事。海上相望的八個國家——朝鮮、韓國、日本、越南、菲律賓、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同樣是有賊心沒賊本事的居多。總之，就國際環境而言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大灰狼”敲門式的威脅了。

就國內情況而言，影響國內安全穩定的“六大基礎性因素”都沒有大的問題，比如：經濟基礎方面，工業生產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大於農業生產；政治基礎方面，共產黨一黨主導、多黨合作

的政體穩定；生產力水平方面，雖然還不如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但也在世界前列；社會基礎方面，農民與地主的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還不至於引發大的社會動亂；國際環境方面，我們沒有擴張，也沒有面臨大的威脅和外辱；思想文化方面，沒有強烈的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學生運動、軍隊兵運、“宮廷”政變等“五大社會亂象”都沒有發生。尤其是黨的政策不但沒有出現大的失誤，而且隨著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與和平崛起、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等理念的提出，“人心思穩、穩中求富”已成大勢。2006年，美國皮尤世界民情年度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人對執政黨和國家政府、生活狀況的滿意度為81%，美國僅為29%，日本為27%，法國才20%。宏觀經濟穩定、社會整體穩定、政治局面穩定，是一個時期以來中國高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國內安全的重要保證。歷史上，大災有大愛，但大災也有大亂。“5.12”大地震，不僅沒有出現大亂，還使“所有中國人都站在了黨的一邊”。這是國內安全穩定最好的標誌！可以說，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我國出現大亂的可能基本不存在。

那麼，中國還有沒有安全威脅？中國的安全威脅是什麼？這是一個必須面對、必須回答的問題。

就國內情況而言，主要有三大問題。首先，臺灣問題還沒有解決。這是最大的不安全，臺灣問題對於我們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大國崛起的國際形象問題、國內國際政治牽扯問題、海洋戰略通道安全等問題上。

其次，國內敵對勢力還沒有停止破壞活動。藏獨、東突獨、1989年“六四事件”形成的民運分子、李洪志的法輪功邪教，是長期以來影響國家安全重要的不穩定因素。雖然，這些因素成不了大氣候，但多少有些像“癩蛤蟆上腳背——不咬人膈應人”。“3.14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當然，對這一事件也有一個“怎麼看”的問題。我認為，這一事件屬於一個國家正常的不正

常情況。類似的情況，一個時期以來發展中國家鬧過，發達國家也鬧過（法國、英國、美國都發生過）。古今中外，一個國家內部時常可能出現一些問題，就像一個人再健康也要長疥子、要生瘡一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沒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這一事件是一些西方國家長期敵視中國的必然。德國媒體公開講，“西藏問題”是西方國家對付日益崛起的中國的一張“王牌”。東方人的嫉妒是背後小捅咕，充其量罵娘，西方人的嫉妒則是公開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昔日的“東亞病夫”今天強大了，總是有一些西方人心裡不舒服，使個絆子、捅個刀子再自然不過了。這一事件是直接衝著奧運來的。奧運會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強盛的重要標誌，因此也成為敵對勢力造謠生事的重要目標。瞅著中國崛起不舒服的一些國家，一方面提出“抵制奧運”，歐洲議會議長珀特林、法國總統薩克齊、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美國民主黨總統競選人希拉里和奧巴馬，以及一些好萊塢影星、國際藝術大師都捲了進來；另一方面，搞一些像“3.14 事件”這樣有組織、有預謀的破壞活動。像 2008 年 2 月份烏魯木齊發生的“東突獨”事件、3 月 7 日發生的人體炸彈企圖襲擊民航客機事件等等，都不是偶然的。據有關方面介紹，在奧運會志願者中，已經查出五百多名東突獨等分裂分子、民運分子、法輪功分子，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搞破壞。

再次，階級矛盾問題日益凸顯出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目前，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按照列寧的說法即國家資本主義階段）。為了發展經濟、補充資本的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允許私有資本的存在、大力發展私有經濟，實行了國有、集體所有、私有等“多元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對於加速經濟發展無疑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所帶來的問題也是十分明顯的。有了錢的資本家絕不會滿足已經擁有的財富，擴大剩餘價值、獲得更多的利潤是他們不懈

的追求。一方面，許多資本家拼命地壓榨老百姓。2007 年曝光的山西黑磚窯事件，2008 年 3 月又曝光的哈爾濱智障黑奴事件，4 月曝光的廣東東莞上千名童工事件等等，從中可見資本家剝削的殘酷性和不可改變性。據有關資料介紹，僅 2005 年一年就發生了八萬多起群體事件，其中有 80% 以上是由於私有企業勞資矛盾所引發的。另一方面，許多資本家開始大力訴求政治。拉攏腐蝕黨政官員已經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同時，許多私有資本擁有者還通過拉選票進人大、進政協，甚至企圖鑽進國家政府機關，有的還“積極”入黨，以獲得他們所希望擁有的權力。“有錢能使鬼推磨”，一些政府官員也把資本家當“財神”供起來。今後一個時期，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不夠與資產階級不斷壯大的矛盾會越來越突出，一方面我們要加快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斷推進社會進步；一方面又要防止資產階級形成“氣候”。資本家集團如果進一步坐大，並形成“整體合力”，那麼，勢必將對黨的執政地位、對社會的穩定構成嚴重威脅。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原則：“既要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觀點”。

從國際情況看，主要有六個方面的問題。

（一）從經濟角度看。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思想，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都可以歸結為生產，除了人的生殖繁衍之外，最主要的生產無外乎兩種：一種是生產資料的生產，一種是消費品的生產。資產階級工業革命，帶來了工業化大生產。今天的“全球化”，實質上就是現代條件下的工業化大生產，全球資源、全球調配、全球生產、全球市場、全球貿易、全球流通。

目前，中國以佔世界不到 10% 的耕地、6% 的可更新水資源、3~4% 的森林資源，養活著 22% 的世界人口。人均可耕地面積僅佔世界可耕地面積的 40%。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融入國際社會，特別是加入 WTO 以來，已經成為“世界工廠”、世界“最大的市

場”。在全球性工業化大生產的鏈條中，中國是產品生產大國、外貿高依存度大國。有資料介紹，今天的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出口國，第三大貿易國，第四大經濟體。有報道說，至 2007 年底中國是世界第 13 大對外投資國，投資對象已達 172 個國家和地區，淨投資近一千億美元。據世行報告，2003~2005 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 GDP 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 13.8%（最新消息說，2007 年中國的貢獻率已達 17~20%），僅次於美國的 29.8%，世界排名第二。一個時期以來，中國有 40% 的生產資料來自國際社會，62% 的產品銷售到國際社會。這一進一出、大進大出，保障了中國經濟長期維持高達 10% 左右的增長率，把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同時也使中國在全球面臨著三個安全問題：一是生產資料來源地安全，二是產品市場安全，三是流通渠道安全。

一個時期以來，中國在海外的企業、市場、勞務人員遭受生命財產傷害的情況屢屢發生，比如 2003 年西班牙一座城市發生火燒中國鞋店的事件、2005 年俄羅斯發生國家政府機構沒收大批中國物品事件、2008 年 3 月贊比亞發生攻擊中國煉銅廠事件，等等。目前，已經開始由針對某個人、某個企業，發展為針對國家。2006 年，非洲的尼日河三角洲武裝力量就公開致電中國政府，聲言中國在當地的石油開採是侵略行為，要對中國政府“開戰”。隨著全球性工業化大生產的不斷發展，中國已有七千多家海外企業，每年已有上百萬人在海外勞務，有 3500 萬人通過正常渠道出境，加上海外數千萬華人華僑，中國公民、僑民在海外安全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從政治角度看。就世界整體而言，基本上是“一超”、“多大”的格局，即美國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歐盟、俄羅斯、中國、日本、印度、巴西等幾個國家是世界性大國。“一超”、“多大”基本上左右了世界形勢，“大國政治”、“大國關係”

是當代世界的突出特點。

今天的七大國，美國的目標，是“管理世界、修理地球”；歐盟的目標，是與美國共管世界；俄羅斯的目標，是重振雄風；日本的目標，是做“正常國家”，在世界上“說了算”；印度的目標，是做“印度湖”的主人、世界強國；巴西的目標，是成為“21世紀的世界大國”。只有中國比較保守，提出要實現“和平崛起”、做“負責任的大國”。雖然，目前七大國包括美國在內都非常清楚，“大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大國之間的競爭卻是不可避免的。冷戰結束以來，七大國爭資源、爭市場、爭資本，已經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即人類社會最根本的關係是利益關係，任何友誼、情義、道義、責任，在利益面前都是十分蒼白的。圍繞著各自的利益，各大國在對華問題上幾乎也是一致的：美國、歐盟搞武器禁運、搞科技封控、搞反傾銷，俄羅斯在能源問題上光是“嘴上會氣兒”，日本與中國爭能源、爭市場，印度搞對華產品封控，巴西對中國在拉美的經濟滲入表示擔憂，等等。

（三）從文化角度看。“文明的衝突”很可能帶來新的安全問題。人類歷史就是一個宗教信仰不斷演化的過程。由動物崇拜、祖先崇拜、靈物崇拜、大自然崇拜，發展到今天，進入了英雄崇拜的時代——崇拜偉大的神靈。目前，雖然世界上還有數百種宗教信仰，但最主要的是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佛教（融儒釋道於一體的中國佛教）等幾大宗教。

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等都屬於“一神教”。“一神教”只信仰“唯一的神”。比如，猶太教“唯一的神”是上帝耶和華，伊斯蘭教“唯一的神”是真主安拉。東方的宗教則不然，以中國的儒教、道教、佛教為例，都屬於“至高神”教，即“多神教”。也就是說，在一個最“大”的神之下，還有眾多的神。比如，儒家講“人皆可為聖賢”，道家有“太上老君”和“八仙過

海”，佛家有“如來佛祖”、觀世音、八百羅漢等，甚至連灶王爺、財神爺都是老百姓所供奉的“仙”。通俗地說，中國人什麼神都信，其實質則是什麼神都不信——想信什麼就信什麼、想什麼時候信就什麼時候信。“一神教”與“多神教”最大的區別，前者具有惟一性、排他性，後者具有包容性、兼容性，海納百川。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以阿拉伯國家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的矛盾，表現在文化層面，就是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

那麼，這與我們國家安全有什麼關係呢？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儒家思想，從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利瑪竇傳到西方開始，已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今天，在世界上孔子學院以每四天誕生一所的速度發展，已經有160多所、覆蓋了50多個國家，預計到2010年世界上將有五百所孔子學院。中華文化的迅速傳播與“中國製造”、“中國擁有”、“中國服務”的遍佈世界遙相呼應，尤其是“中國模式”對五百多年來西方國家發展模式的鉅大衝擊，必然帶來相應的反傳播甚至強烈抵制。一個時期以來，由於價值觀的分歧，一些西方人一方面為能夠買到中國貨而高興不已，一方面又大罵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用中國的一句俚語講，就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就罵娘”。可以預言，雖然今天兩個“一神教”水火不容，明天就可能是“一神教”與“多神教”之間“文明的衝突”。

（四）從地緣角度看。目前，中國有2.2萬公里的陸地邊界，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40%左右，經濟總量佔60%以上。我們生存的地球，71%的面積是海洋，有人居住的陸地，大體上被海洋分割為歐亞、非洲、澳洲、北美、南美等五大塊。這就決定了無論是生產資料的流通，還是產品的流通，90%以上都需要依靠海洋輸送。同時，海洋也是人類生存的第二個空間，海洋資源對於人類未來的生存與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今天，中國在海洋上面臨三大難題。

東海問題。日本是一個能源十分匱乏的國家，98%以上的能



源依靠進口，他們認為東海的石油“夠日本用一百年的”，因此東海被日本視為“生命海”。以釣魚島為軸心的東海，自古是中國的領土和管轄水域，中國能白白地送給日本嗎？不能！戰後日本已經實際控制釣魚島 60 多年，日本能輕易地還給中國嗎？也不能！那麼，結果就很可能是戰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南海問題。南海的重要性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豐富的油氣資源，屬於世界四大海洋油氣聚集中心之一，素有“第二個波斯灣”之稱。二是“兩洋結合部”，南海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咽喉，是多條國際海運線路和航空線路的必經之地，也是扼守馬六甲海峽的關鍵所在。三是華南地區重要的戰略緩衝區，中國擁有南海，整個華南地區的戰略縱深就可以延伸大約一千海浬；中國失去南海，整個華南地區的戰略縱深就只有海南島周圍的幾十海浬。四是國際形象甚至黨的執政地位問題。道理很簡單，一個連自己眼皮底下的利益都無法保護的國家，怎麼可能保護他的海外利益、又怎麼可能創建和諧世界呢？一個無法經略自己管轄海域的國家，實現和平崛起、創建和諧社會也是一句空話！

今天在南海已經出現了“群鼠戲大貓”的情景，五六個小國欺侮中國一個大國。南海總面積 205 萬平方公里，這個範圍，佔我國 1260 萬平方公里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 16.3%；佔我國 300 萬平方公里海洋主權和權益的 68.3%。目前，南海的爭議面積達 143 萬平方公里，有 43 個島礁被周邊五個小國非法侵佔。我實際控制的範圍不足 62 萬平方公里。長期以來，在中國地圖上赫然標繪的顯示中國南海主權範圍的“九段線”，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由於我們沒有力量控制自己的管轄水域，因此從 80 年代以來只好搞“擱置主權，共同開發”。這意味著什麼呢？自己的錢被小偷偷了，我們說“沒事兒，有錢大家一塊花”！這是大方還是無能呢？

“兩洋”問題。在印度洋方向，中國與歐洲、非洲、中東地區的貿易往來主要通過印度洋，中國進口石油的 51.7% 來自中

東；30%來自非洲。中國的四大戰略通道有三個在印度洋及其相關海域。<sup>1</sup> 在南太平洋方向，東南亞是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澳大利亞是中國最大的礦產資源進口基地，拉美的石油將可能佔中國進口石油的近20%，是中國重要的糧食進口基地。從一定意義上講，“兩洋”問題是中國未來生存與發展的生命線。然而，一個時期以來世界上有一種說法，即“美國海軍在保護著中國的海上戰略通道。”這話不中聽，但卻是事實！

（五）從科技角度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安全，有著十分深刻的影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手槍戰勝利劍”、軍艦大炮打開東方國家的大門，這些都是歷史的真實寫照。當今世界，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已經逐步拉大了世界各國的差距。有中國專家組分析認為，在科學技術發展的總體水平上，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平均為10~15年，最小的五年，但最大的則有近一百年。今天，我們為自己擁有大量的電腦、手機、家用電器而高興，神五、神六上天，KKV打衛星、激光致盲衛星了，“嫦娥”奔月，我們都為之歡欣鼓舞。孰不知，這些東西與美國、歐盟、俄羅斯都有很大的差距。就日用科技而言，由於科技水平落後，我們賣了力氣、壞了環境、挨了臭罵，只賺了幾個小錢。比如：我們是DVD生產大國，DVD在國際市場上的售價為39美元，但由於70%的機芯等都要進口，因此我們要向外國支付19.7美元的專利使用費。再如，我們每年向美國出口2000萬個鼠標，每只鼠標在美國賣40美元，但由於技術是人家的，我們只能掙三美元，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成本費。就高科技而言，俄羅斯的加加林早在40年前就進入太空了，美國的阿波羅登月也是近40年前的事情。2008年2月20日美國打衛星，用的是現役艦艇和導彈，也就是說，目前的美國已經具備了打衛星的實戰能力。

---

<sup>1</sup> 四大戰略通道為馬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

2008年5月26日7時53分，美國的“鳳凰”號火星探測器成功地登陸火星。它在太空中飛了九個月，走了7.11億公里，目前已經成功地傳回了圖像和氣象信息。客觀地講，在太空技術發展方面，中國落後美國大約50年左右。因此，世界上有人說中美兩國的太空計劃是一場“龜兔賽跑”。

另外，在DNA的研究上，克隆個牛啊、羊啊、人的耳朵鼻子，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德國、美國、丹麥、日本等一些國家的有關部門懷著不同的目的，利用當時中國對基因資源重要性認識不足的機會，對中國人的基因資源進行了舉世震驚的鉅大掠奪。據一位叫童增的學者介紹說：“利用這些中國人的DNA，在一些發達國家現有軍事科技水平的條件下，足以研究出針對中國人的各式各樣的基因武器，能研製出讓中國60歲以上的人患老年癡呆症、讓中國的婦女患絕育症以及讓中國的士兵在激烈的戰場上熟睡三天三夜等等各類基因武器。”目前，生命基因武器具有實戰功能只是個時間問題，首先面臨滅頂之災的將可能是中國！

（六）從國際責任看。崛起是中國最大的時代特色，同時也是中國最大的安全問題來源。“中國責任論”是繼“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之後，美國率先提出的一個客觀的甚至帶點積極色彩的輿論。這種國際輿論，有利於中國立足國際舞臺、有利於中國的發展，當然，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實際上，即使沒有“中國責任論”，中國也面臨著如何對待國際責任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如若不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就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大國、強國，也絕不是真正的崛起；中國如若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又有可能引出一些麻煩，這就如同日常生活中“活幹多了毛病也多”如出一理。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在海外將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一些戰爭或非戰爭軍事行動，一方面是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一方面也是

創建和諧世界的需要。比如，對於朝核問題、伊核問題、伊拉克問題、緬甸問題、阿富汗問題、黎以衝突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問題，以及國際反恐等，中國都面對著一個應當如何措置的問題。有一些問題，明擺著就是馬蜂窩，捅也得捅、不捅也得捅，其結果必然是“招蜂引蝶”。這是一個大國在國際事務中“原始積累”不能迴避的問題，一個欲作世界強國的國家必須付出的代價。

在國家安全形勢判斷上，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即如何看待美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之間經歷了“對抗”、“聯合”、“合作+鬥爭”、“發展合作、不搞對抗”四個歷史階段。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決定中美兩國關係的核心問題，一是臺灣，二是如何對待中國崛起。可以說，這兩個問題，既取決於美國，也取決於我們。我們總講美國有冷戰思維，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自己也存在著冷戰思維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講，“9.11”事件之前美國一直處於戰略迷茫狀態，從蘇聯解體開始就在不斷尋找新的敵人，用美國著名“政治軍事戰略家”托馬斯·巴尼特的話說，總在尋找“大傢伙”。中國曾一度成為美國的“大傢伙”。但是，“9.11”事件促使美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戰略轉變。中國不僅不再是美國的敵人，而且美國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這是歷史的必然，是一個必須儘早認識的事實。

美國是一個以現實主義為基本理念的國家，雖然不一定喜歡中國，但與中國交惡，無論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還是國際戰略格局上，無論現實還是未來，都對美國十分不利。因此，中美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微乎其微。一個時期以來，在美國國內，對華態度上一直存在三大觀點。一種是以國務院、財政部為代表的“接觸中國”，一種是以五角大樓為代表的“防範中國”，再一種是極少數的民間學者、在野的政治家，他們渲染的是“中美開戰”。2005年，美國進行了一場關於中國的大辯論，結果之一就是正視中國的崛起，認定中國是美國的“利益攸關方”，讓中國

成為美國的幫手，承擔國際責任。可以說，用對話而不是對抗的方式來處理兩國間的問題已經成為中美雙方的共識。可以說，正確認識美國是戰略判斷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綜上所述，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我們的國家利益表現在安全方面主要有以下八點：（1）政權穩定、領土主權安全；（2）祖國統一；（3）周邊安寧；（4）主要資源來源地、市場所在地、戰略通道穩定安全；（5）國際形象良好；（6）主要相關地區經濟運行正常；（7）中華文明傳播通暢；（8）沒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包括氣候劇變、洪水災害、強烈地震、冰雪災害、嚴重沙漠化等）。通過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可見，國家安全面臨的大的威脅沒有，但小問題不少；家裡家外都有事，“外頭”的“小事”將會越來越多（尤其是“大灰狼”和“小狼崽子”還滿世界的禍害我們、敗壞我們的形象）；國家生存所面臨的威脅基本可以排除，伴隨著國家發展而產生的安全問題將日益凸顯。

## 第二，祖國統一任重道遠

2008年，是臺灣政治局勢的“拐點年”。對於臺灣形勢的深刻變化，也有一個怎麼看的問題。

我認為，今天臺灣政局的重大變化，“臺獨”是一個原因，但絕不是主要的原因，更不是惟一的原因。除了我們十多年的積極努力之外，也是島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陳水扁執政八年，只“講政治”不搞經濟。臺灣經濟年增長率由他執政前的6.5%下降至3.2%；失業率由執政前的3%上昇到4.5%；臺灣當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07年關門破產的臺灣企業達到40800家，創歷史新高。臺灣一項民調顯示：目前臺灣有41.6%的人對未來深感悲觀；70%的人擔心未來的日子不好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下滑、百姓遭殃，棄扁就是一種必然。其次，腐

敗醜聞不斷。先是陳水扁的子女有事，再是老婆有事，後來陳水扁自己也不乾淨。要下臺了，又曝光了被稱為“世紀騙局”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外交弊案。第三，民進黨否定孫中山尤其是否定蔣經國不得人心。蔣經國畢竟是臺灣成為“四小龍”的主要領導人，民進黨由“地下黨”成為“在野黨”、“執政黨”，畢竟是蔣經國“解禁”的結果。否定蔣經國就否定了臺灣幾十年改革發展的成就。第四，臺灣在國際上越來越孤立。目前只有 23 個小國窮國承認它，而且還不知道哪天又不承認了。甚至連靠山老子“山姆大叔”也得罪了，惹得布什、賴斯公開出來抨擊陳水扁。2007 年，臺灣智庫的執行委員、臺灣東吳大學教授羅致政甚至說：目前的美國對臺政策基本上都是“中國製造”。第五，兩岸關係緊張，使臺商很難發展。臺商怨聲載道，“總統”選舉時，大批臺商不惜重金購票返回臺灣去投國民黨一票，就是這個原因。第六，“政黨輪替，民衆得益”的必然。民進黨執政八年，老面孔老一套了。喜新厭舊是一種文化傳統，也是現實利益使然。

總之，我們必須看到，民進黨的失敗並不意味著“臺獨”的失敗，國民黨的勝利絕不是統一的勝利。在“總統”大選中，投民進黨“入聯公投”贊成票的有 553 萬人，投國民黨“返聯公投”贊成票的有 496 萬人，雖然雙雙敗落，但兩家的總票數加在一起為 1049 萬張，達到投票人的近 72%。對這個問題，如果說國民黨搞了一個“瞞天過海”，那麼，我們絕不能自欺欺人！。

馬英九是個民族英雄還是個民族敗類，還需要進一步觀察。從目前情況看，在馬英九的政治天平上，總統寶座大於民族利益，島內民意高於大陸民意，美臺關係勝於兩岸關係。在與我周旋的策略上，馬英九很可能是經濟上多佔我的便宜，政治上給我出大難題，軍事上讓我出手無據（不統、不獨、不武，讓我們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自從當選“總統”之後，馬英九多次表示，“在有生之年不可能看到統一”，兩岸統獨的關鍵“不是主權，

而是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他們所推崇的民主與自由。可以說，在一手抓經濟，一手打民主政治牌的情況下，臺灣問題將對我構成新的更為嚴峻的衝擊！

島內已形成“選舉政治”的氛圍，政黨輪替很可能成爲一種常態。民進黨要想“翻身得解放”，就必須進一步打“臺獨牌”。而“臺獨”在島內，又有著深厚的民意基礎。島內民調顯示，自認爲是“臺灣人”的比例並沒有因爲民進黨的下臺而減少更沒有崩盤；“臺獨”傾向也沒有因爲民進黨的失敗而下降更沒有落套，“總統”選舉中就有40%的人投了民進黨的票。

可以預見，即使馬英九有意促統，要想讓統一成爲島內民意的絕對優勢，也非一日之功。因此，祖國統一，任重道遠！隨着形勢的發展，對臺灣問題到了一個需要再認識的階段。

#### （一）臺灣問題的癥結到底是什麼？

有人說，臺灣問題是個兩岸經濟問題，大陸富有了，臺灣自然而然就回來了。有人說，臺灣問題是個敢打不敢打的問題，只要敢打，臺灣人就害怕。有人說，臺灣問題是個美國問題，美國不干涉，中國早就統一了。也有人說，臺灣問題是一小撮“臺獨”分子鬧的，打掉、搞垮“臺獨”勢力臺灣問題就解決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至於臺灣問題的癥結到底是什麼，還可以進一步分析研究，但依我之見，臺灣問題起碼有“四個不只是”。

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兩岸經濟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當時大陸提出要實現祖國統一，“葉九條”一公佈臺灣島內曾出現一幅漫畫：畫中的大陸人穿得破衣襤衫、騎著一輛東倒西歪的舊自行車，臺灣人則西裝革履、坐在一輛豪華轎車裡，還抽著“三五牌”香煙；大陸人對臺灣人說，回來吧，我們給你足夠的經濟保障！臺灣人則說，瞧你都窮成那樣了，我要回去你還不把我的褲衩都扒光了？20多年過去了，斗轉星移，今

天的兩岸經濟狀況已經發生了十分深刻的變化。有資料介紹，2007年，大陸國民收入達到3.61萬億美元，臺灣則只有3800億美元（廣東省已達4000多億美元，今後幾年還將有三四個省超過臺灣）。從實際購買力看，目前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差距並不太大。預計到2010年，大陸的國民收入將達到四萬億美元，很可能要高出臺灣十倍以上。2006年，兩岸經貿往來額已經突破一千億美元。其中，對臺出口207.4億美元；進口871.1億美元。大陸是臺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最大的順差來源地。換句話說，2006年大陸給臺灣送去了六百多億美元，按2300萬臺灣人計算，每人平均可以分得兩三千美元。2007年800億，平均每人3478美元。大陸對臺貿易的大量逆差，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市場經濟問題，大陸對臺灣的善意自在不言之中。但是，目前在臺灣趨向統一的因素並沒有因此而增長，反而還在迅速減少。這是為什麼？

不只是一個敢打不敢打的問題。改革開放之初，為了確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為了兩岸的長治久安，大陸確定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總方針，大幅削減了軍費開支。20世紀90年代初，大陸軍費僅有不足一百億美元，而臺灣已超過一百億美元。90年代中後期，“臺獨”形勢嚴峻，迫使大陸不得不加大軍事投入。2007年國家安排的軍費開支為445.16億美元，2008年國家公佈的預算中軍費開支已達572.29億美元，這是臺灣所望塵莫及的。就武器裝備而言，在第三代戰機、戰役戰術導彈、大型艦艇、太空裝備、電子戰裝備、主要陸戰裝備等方面，臺灣以往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如果僅從武器裝備角度講，對臺灣實施一定規模的軍事打擊根本不成問題。對於這一點，臺灣當局心裡非常有數兒。2007年9月，陳水扁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專訪時非常明確地說，他清楚地知道，大陸在“2007年底前要實現‘全面應急作戰能力準備’，2010年前完成‘大規模作戰能力準備’，2015年前完成‘決戰決勝能力準備’。”但是，臺灣挑戰大陸的勁頭並沒有因



此而減小，反而越來越猖狂。這是為什麼？

不只是一個美國問題。不能否認，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扮演了一個十分討厭的角色，美國的利益要求臺灣最好是不統不獨。但是，按照“內因是變化的根本，外因是變化的條件”的原理，臺灣問題根本不是由美國因素所決定的，美國充其量是一個重要的外因而已。以前，我們不強大，美國人支持臺灣搞獨立，蔣介石沒有獨；今天，我們強大了，美國人反對臺灣“四要一沒有”，陳水扁並不聽。隨著大陸的日益強大，美國與大陸、臺灣的利益天平必將日益倒向大陸，聰明的美國人不會傻到不知哪頭輕哪頭重的地步。但也必須看到，美國對臺灣的影響力，並沒有因為美國與大陸的利益關係增強而增強，反倒有所減少。這是為什麼？

不只是一小撮“臺獨”勢力的問題。按常理說，大陸的經濟發展了、軍事強大了、美國人也不再更多地幫臺灣說話了，兩岸同宗、同文、同信一個“媽祖”，統一應當沒有什麼問題了。然而，今天的臺灣民衆對大陸似乎進入了一個“情感怪圈”——做什麼生意都可以，就是別做統一的“生意”，給錢、給物、給什麼都要，就是不要統一！如果說以前的癥結在一小撮“臺獨”勢力，那麼，今天的問題恐怕就不僅僅是個“臺獨”勢力的問題了。臺灣有一項持續了 14 年的民意調查，主題是“你認為自己是什麼人”？2006 年 6 月，這項調查顯示，44% 人認為自己“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44% 的人認為自己只“是臺灣人”，只有 6% 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的臺灣人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另據島內媒體報道，民調顯示以臺灣名義申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成員國，得到 95% 左右民衆的支持；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也獲得 77% 左右民衆的支持。可以說，“臺獨”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臺灣人的理念。這是為什麼呢？

上述“四個不只是”透著一個核心問題，即臺灣的民意。簡言之，臺灣的老百姓贊成統一的不少，想獨立的不少。這是我們

必須承認的一個現實。因此，我們不能再簡單地說“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導致臺灣民意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臺獨”勢力的長期教化之外，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個是歷史的原因。自從16世紀葡萄牙“登陸”臺灣以來，四百多年中，臺灣先後16次遭到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侵略和霸佔，其中有兩次淪為殖民地。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政府一紙《馬關條約》把臺灣賣給了日本50多年，國民黨跑到臺灣又搞了50多年，兩岸隔絕一百多年。時間是最好的“健忘藥”，沒有感情何談統一。況且，李登輝執政12年、陳水扁在位八年，20年的“臺獨”理念教化，好人也能生出壞蛋來！

一個是政治上的原因。這個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臺灣式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今天的臺灣人，已經習慣了他們所說的民主、自由。吃飽了、喝足了，可以有一百萬人什麼也不幹，整天在總統府門口鬧騰；可以從臺北到臺南，手拉著手搞環島大遊行；可以像李敖那樣，逮著誰罵誰。這樣的民主、自由不要說在大陸，就是美國、英國、法國等老牌西方國家也行不通。第二是臺灣的政治身份訴求。今天的臺灣，以“中華民國”的身份面對世界，在國際上只有20餘個國家承認它，雖然經濟上位列“四小龍”之首，但在國際組織中基本沒有地位。不滿現狀，是臺灣最大的政治問題。16、17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政治家托馬斯·霍布斯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即內戰的爆發往往源於三個因素，一是對現狀不滿，二是具有不滿現狀的理由，三是具有改變現狀的能力和條件。那麼，今天的臺灣這三點都具備了！

再一個是大陸軍事能力的原因。目前，雖然大陸的軍事實力超過了臺灣，但距離形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絕對優勢還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大陸擁有了讓“臺獨”勢力望而生畏、不敢觸“獨”的軍事實力，“臺獨”勢力也絕不敢做出以卵擊石的舉措。

（二）解決臺灣問題到底是否需要使用武力？

150 多年的中國歷史證明，內戰對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傷害是鉅大的。衆所周知，在世界工業化進程中，非洲和中東地區始終發展不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內戰不已。列寧曾強調要記住西塞羅的一句話：“最大的災難是內戰”。應當肯定地說，我們並不想使用武力實現祖國統一。但是，在臺灣問題上要做具體分析。

首先，要從大陸軍事實力的發展情況看。如前所述，如果大陸的軍事實力強大到足以令“臺獨”勢力望而生畏、不敢觸“獨”的程度，那麼，使用武力就是多餘的了。問題是，大陸的軍事實力還沒有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臺獨”問題會不會等到你發展到這種程度？

其次，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上進行考察。中國有兩句老話，一句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再一句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不死心”，這是一種文化傳統。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臺灣人是中國人，這種文化傳統也是根深蒂固的。

第三，要從人類歷史上去考察。就中國而言，歷史上十次統一都是打出來的，三次解決臺灣問題也是打出來的。就世界而言，戰後四個分裂的國家，越南統一是打出來的，朝鮮打了也沒能實現統一，德國雖然沒有進行“熱戰”但是依靠 50 多年的“冷戰”實現了統一。

正是基於上述一些考慮，可以斷言，解決臺灣問題離不開使用武力手段。尤其是要想徹底解決“臺獨”問題，就必須具有“解放”臺灣的能力。否則，就不要奢談和平統一，起碼不要指望能夠輕輕鬆鬆地解決臺灣問題。

### （三）美國干涉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說“祖國統一，任重道遠”，包括對美國因素的考慮。但絕不是因為美國因素，才“任重道遠”。對美國因素的關注，根本目的不在臺灣，而在中美兩國關係的大局。實際上，對於美國是否會進行干涉，是一個無須回答的問題。自 20 世紀 50 年代初的

朝鮮戰爭開始，美國就沒有停止過對臺海問題的干涉，而且還搞出個《與臺灣關係法》，就是想為一旦干涉臺灣問題時提供法律保障。但問題關鍵是，美國的干涉程度到底有多大？美國會不會直接出兵干涉？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利益決定論”的思想進行考察，我認為，美國以武力干涉臺灣問題哪怕是出動一兵一卒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這一判斷，主要基於以下四點考慮。

一是中美一旦開戰，美國將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樹起一個百年仇敵。國際政治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僅以聯合國問題為例，戰後美國搞起來個聯合國，目的是幫助美國“管理世界，修理地球”。當年，國民黨中國被美國拉進聯合國並成為安理會的五大國之一，目的就是讓中國給美國當跑腿的，當時的美國並沒有想到共產黨會奪取政權。今天的臺灣，即使獨立了、進了聯合國，也不可能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投票，在一定意義上是“得道”與“失道”的重要標誌，也是一個大國在世界上能不能幹成幹好一件事的的關鍵所在。自 1946 年成立聯合國安理會到 2004 年，五大國共投了 245 張反對票，其中蘇俄投了 117 張，美國投了 75 張，英法投了 48 張，中國投了五張。換句話說，對於美國想幹的事，中國基本上沒有投什麼反對票。但如果美國介入臺海戰事，中國就可能永遠不會再投它的贊成票，就是投棄權票的可能性也不大。這樣一來，美國要想在這個世界上幹點事情，就沒有那麼容易了，聯合國對於美國來說也就不再是幫手而是敵手了！

二是中美一旦開戰，美國經濟將受到嚴重影響。臺灣擁有 2300 萬人口、3.5 萬平方公里的面積，這個市場才有多大？大陸有 13 億人口、960 多萬平方公里的陸地、360 多萬平方公里的管轄水域，這個市場有多大！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的馬漢就提出中國將是 20 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今天，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同時還是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目前，中國出口產品

的 19% 叫美國買去了，中國產品佔美國市場所有產品品種的 85%。 “中國製造、美國買入” 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一道“亮麗” 風景。有人管這叫“美中融合經濟”。美國商務部公佈，2006 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 2325 億美元，佔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 30%。從 2006 年開始，美國政府每年都要派出高級代表團與中國進行兩次“高端綜合經濟政策對話”。有消息說，至 2008 年 1 月底，美國的淨外債為 2.5 萬億美元，中國一共買了 4926 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約佔美國全部債務的 18.2% 左右。目前，在中國所擁有的 1.6 萬多個億的外匯儲備中，有 70% 是美元，20% 是歐元，10% 是日元。這筆錢意味著什麼？有西方媒體形容說，這筆錢相當於道一瓊斯所有股票總市值的四分之一，只要北京願意，“隨時有能力” 收購埃克森、英特爾、波音等美國著名工業企業。

十多年前中美貿易順差剛過一百億美元時，美國人不高興了，我們的總理還專門到美國給美國人消火。那麼，今天我們掙了美國人那麼多錢、擁有那麼多的美元，美國人為什麼不說話了呢？這是因為，我們把從美國人左兜裡掏出來的錢，又從右兜裡送回去了。給美國“送錢” 方式，除了購買它的國債之外，還有一種是每年一度的赴美“採購”。2006 年一次性採購了 162.1 億美元的美國產品，2007 年一次性簽署了投資或採購協議 138 個項目、總計 326 億美元。正因為如此，國際上有經濟方面的專家說：中國只要動一動“國債” 這個“槓桿”，拉一拉外匯儲備這根“繩兒”，“美國政府就會心驚肉跳，美聯儲主席就得上吊”！2007 年 8 月，兩位中國的經濟學家發表言論，說中國可以利用外匯儲備作為中美“高端經濟對話” 的談判籌碼，結果如“一石擊起千層浪”，攪得美國朝野不安。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在西方國家出現衆多政要“抵制奧運” 的叫喊中，惟有美國總統布什公開表態“我沒有理由不去北京”。

三是中美一旦開戰，美國將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國人實

實際上非常清楚，在這個世界上，歐盟是美國在科技上、經濟上最大的競爭對手，科技水平差不多、經濟總量差不多（目前，歐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 32% 左右，美國佔 25% 左右，中國僅佔 5.9% 左右），歐盟的人口比美國的還多；俄羅斯是美國最具威脅的軍事對手，不僅擁有與美國數量相當的核武器，而且在投送技術、突防技術上還超過了美國；日本是最崇拜也是最“憎恨”美國的“戰略夥伴”，歷史上兩次入侵美國的是日本，兩次進入日本的是美國，人類實際使用的兩顆原子彈都是美國人扔在了日本人的頭上；印度人是從來不聽美國吆喝的，而且一直企圖控制“印度湖”；巴西位於美國的後院，沒事拉倒，有事就是病。而中國，無論是從經濟、科技、軍事還是從地緣角度講，對美國都不構成威脅。如果中美開戰，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中國損失的是發展機遇，而美國損失的將是霸主地位。

四是中美一旦開戰，美國將在軍事上遭受鉅大的損耗。衆所周知，美國賴以維繫世界霸權的重要支柱，是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歷史上，中美兩次交手，美國都遭受了鉅大損失。朝鮮戰爭打了兩年半，美國人傷亡 50 多萬，其中死亡五萬多；越南戰爭打了 12 年，美國又傷亡 50 多萬，其中死亡也是五萬多。中國不是南聯盟、不是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今天的中國也不是 50 年前朝鮮戰爭時期的中國、不是 30 年前越南戰爭時期的中國。中國的武器裝備雖然趕不上美國，一旦打起來，中國的損失肯定不會太小，但美國的損失也將是它所難以承受的。十多年來，科索沃的事美國管，伊拉克的事美國也管，但印巴衝突美國不出兵，車臣問題美國也不出兵。為什麼呢？因為，一旦牽扯到大國，美國根本無法承受！

總之，在政治、經濟、國際格局、軍事等方面都“不合適”的情況下，有著實用主義傳統的美國人能幹傻事嗎？實際上，美國對於臺灣的基本態度早已明確，當年尼克松總統就曾明確表示：“在和大陸的中國人建立友誼時，我們不會犧牲臺灣的中國

朋友”，但是“放棄支持已久的事業、解除信誓旦旦的聯盟關係，常常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今天，美國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放棄防範中國的立場，但已經把中國視為“利益相關者”，希望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與中國“共管世界”，這些都是出於維護美國自身利益的考慮。

當然，美國也絕不會給我們的武力行動“唱讚歌”，扯著嗓子罵一通、拉出兩三個航母編隊擺個架式，甚至給臺灣提供情報保障，這些都是可能的。同時也要看到，美國是否會進行實質性的干涉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因問題，即我們的實力和決心。

總之，臺灣問題並沒有因為島內政局變化而發生有利於統一的根本性變化，武力手段不能放棄，美國雖然不會實兵干涉但也不會唱讚歌。祖國統一，任重道遠！

### 第三，戰爭與非戰爭軍事行動有許多新特點

預測未來戰爭的特點是一件最難辦的事情。因為，自古以來就沒有兩場完全相同的戰爭。因此，只能依照一般原理、一般規律，綜合考慮政治、經濟、科技、社會發展趨勢，對未來進行一些大體性的描述。

一個時期以來，在未來戰爭問題上有三種傾向，一種是“跟著美國走”，即美國說打什麼仗就打什麼仗。21世紀初，美國提出了要與“大傢伙”（即像俄羅斯、中國這樣的大國）打信息化戰爭的設想，一些軍事專家和學者還描繪了一幅陸、海、空、天、電磁一體的“美式戰爭”的圖景，其核心是“網絡中心戰”。美國著名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最近發表文章指出：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世界上可能有四場大規模戰爭爆發，一個是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戰爭，可能把美國和日本攪進來；一個是俄羅斯和格魯吉亞之間的戰爭，可能迫使美國和

歐盟攬進來；一個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戰爭，可能把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攬進去；再一個，是伊朗和以色列的戰爭，可能把中東國家甚至一些大國攬進去。不能否認，這些戰爭作為一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作為一種現實有多大的可能呢？我們的一些專家又跟著忽悠要打世界大戰了。當代美國著名的“政治軍事戰略家”托馬斯·巴尼特 2004 年就明確指出：我不認為存在著大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我也不認為存在著“美式戰爭”——大規模信息化戰爭。因為到目前為止，既沒有出現這樣的戰爭，也沒有出現這樣的戰爭的任何跡象。巴尼特還強調指出：“大規模的戰爭已經消失，小規模的戰爭正在進入”。

一種是“跟著專家學者的忽悠走和技術發展的功利性追求走”。其實質是“科學技術崇拜”在戰爭領域的反映，其典型代表是有人說未來戰爭就是“太空戰”、未來戰爭是“無人化戰爭”。試想，目前人類生活的主要空間是地球，如果開著宇宙飛船、航天飛機到太空中去打一仗再回來，那豈不是脫了褲子放屁的事！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機器懂政治嗎？機器“講政治”嗎？如果“變型金剛”能夠自己和自己打起來，那麼，這個世界將會怎樣！相信科學沒有錯，但相信科學不等於相信科學家，更不等於相信那些只有一技之長、追名逐利的專家的一家之言。這個世界上早就有“專家誤國”之說。愛因斯坦甚至認為“專家只不過是一隻訓練有素的狗”。當然，愛因斯坦所說的是那些追名逐利的“專家”。

再一種是“跟著媒體的發行量和眼球率走”，即看媒體的、聽媒體的、照搬媒體的。孰不知，我們一些媒體已經十分商業化了，包括一些中央級的報刊、電臺、電視臺就公開講，只要一說打仗、打大仗、和美國打仗的事兒，報刊的發行量、電臺的收聽率、電視臺的“眼球率”，立馬直線上昇，比吃了“禾大壯”的莊稼長得還快！而媒體的說法，有許多就是來自西方國家、來自專家學者、來自專業技術人員的忽悠！



最近，有兩個“熱門”的話題。一個是《貨幣戰爭》，作者把兩百多年來世界上複雜的戰爭問題歸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操縱，似乎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政治家、戰略家都是傻瓜，都是幾個金融寡頭手中的玩偶。其實，列寧早在一百多年前揭露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源時，就曾提出了壟斷金融寡頭導致戰爭的問題，但那並非指哪一個人、哪幾個人，而是指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一種普遍現象。道理很簡單，羅斯柴爾德家族那麼厲害，怎麼還讓希特勒把猶太人殺了個雞犬不寧？！今天，關注國家金融安全沒有錯，從經濟利益角度認識戰爭問題也沒有錯，但把政治問題簡單化、把什麼都說成是戰爭，那就有問題了。如果說“經濟戰”、“金融戰”、“商業戰”也是“戰爭”，那麼，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不是戰爭呢？再一個熱門話題是“能源衝突”。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因能源而發生戰爭的事例，能源匱乏也是一個百年話題，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列寧一百年前都說過。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能源利用率不斷增強，新的能源不斷出現，人們解決能源問題的文明手段也越來越多，戰爭只能消耗能源而不能生產能源。因此，現代條件下戰爭意義上的“能源衝突”，特別是大國之間“能源衝突”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對這兩個問題，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

那麼，未來的戰爭將會是什麼樣子呢？列寧說：“神奇的預言是童話。科學的預言是事實。”從事實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總計爆發了 234 場。其中，發生在非洲、拉美、南亞地區第三世界國家的內亂、內戰、軍事政變等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共 89 場，佔總數的近三成；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 34 場，佔近 15%。在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中，較大規模的國家間戰爭 11 場，美英蘇等大國干涉性戰爭五場，邊境或海上武裝衝突八場，大國入侵性戰爭七場，國際反恐戰爭三場。這些戰爭雖然都是歷史，但也是未來的胚胎。打個比喻，人類今天生的是

孩子，明天也絕不可能生出個“變形金剛”來。

從世界發展的總趨勢和時代特徵看，可以說，今後一個時期，就全球範圍而言在戰爭問題上有“三個基本可以排除”，即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爆發大規模地區戰爭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爆發大國之間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大家不要忘記，人類歷史數千年，真正的世界大戰僅有兩次。爆發世界大戰並不是一件很隨意的事情。當然，由於私有制的存在，戰爭的根源並沒有徹底消除。可以預見，今後一個時期世界上的戰爭和非戰爭軍事行動大體上有以下四種情況。

#### （一）大國之間的衝突

如前所述，大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想像的，但大國之間的競爭則是不可避免的。有競爭，就有矛盾；不可能發生戰爭，但不可能不發生衝突。尤其是在“一超”、“多大”的格局長時期內不可能改變的情況下，各大國之間都有可能發生一些軍事衝突以及由這種衝突所導致的危機。比如：

——“古巴導彈危機式”的衝突。實際上，戰後類似於“古巴導彈危機式”的衝突發生了不少，只是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而已。比如，新中國成立後，臺海發生危機時美國曾先後五六次出動航母編隊，對我進行軍事威懾。美國的一些學者甚至認為，“96.4”事件就是因為美國出動了兩個航母編隊，而“迫使大陸放棄了對臺灣的武力行動”。今後一個時期，亞太的臺海問題、東海問題、南海問題、朝鮮半島問題，南亞的印巴問題，中東的伊朗問題，歐洲的巴爾干半島問題，非洲的蘇丹、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問題，以及南極問題和北極問題、太空競爭問題等，都有可能引發大國之間的“叫板”。

——不預期的海空遭遇性衝突。這種情況，在今後發生的幾率將會不小。隨著各大國對國際事務參與的增多，全球範圍內的軍事活動也越來越多，發生不預期的海空遭遇性衝突的可能性將

明顯增加。雖然，各大國之間不會因為這種衝突而爆發較大規模的戰爭，但衝突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政治事件，並很有可能導致危機的爆發。像前幾年發生的“炸館事件”、“撞機事件”，這兩年的中美潛艇事件、美俄空中相遇事件，英俄大西洋上空對峙事件，俄羅斯巡邏機頻頻飛越太平洋海區美國航母事件，等等，都屬於這一類事件的苗頭。

— 邊境武裝衝突。這是戰後較為多見的一種國家與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的戰爭形式。就世界範圍而言，192 個國家中沒有邊境問題的不多，七個大國幾乎都有邊境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就先後與印度、蘇聯兩個大國發生過邊境武裝衝突，還與越南這樣的中小國家發生過邊境和海上武裝衝突。目前，雖然除了印度之外我們已經與其他國家都簽定了邊境協議，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和不斷拓展的利益因素，以及民族矛盾的影響，發生邊境武裝衝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 “偷襲式”、“拔釘式”打擊。這主要指利用高科技手段，對對方的海上、陸上、空中、太空目標實施隱蔽的打擊。雖然，目前這種情況還沒有發生，但從技術角度講它沒有什麼困難，從政治角度講大國之間有這種需求，因此可以預料它將是一種十分重要的衝突形式。

## （二）大國與中小國家之間的戰爭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強國越來越強，弱國越來越弱，南北矛盾越來越大；“大國政治”已經成為當今國際形勢的主要特徵，而“大國政治”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大國“管理世界”。尤其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總想著要修理那些“無賴國家”、“失敗國家”、“非核心國家”。除了美國之外，蜇伏了一段時期的歐盟尤其是英國，以及俄羅斯、日本等國家也都對“管理世界”躍躍欲試。因此，大國與中小國家之間的矛盾將越來越突出，大國與中小國家之間的戰爭將不會少了。大體上有以下幾種類型。

— “打鐵式”打擊。即大國或者大國聯合多國，像鐵匠打鐵

一樣，把一個中小國家像放在打鐵的砧子上一樣，一頓猛錘亂打，一舉癱瘓或者摧毀對方。像 1991 年的海灣戰爭、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就屬於這種類型。雖然，今後很少可能再現海灣戰爭那樣大規模的戰爭，但這種戰爭樣式還將繼續存在。

— “消耗式” 打擊。即通過較長時間的空中打擊，持續消耗對方的經濟、軍事實力，疲憊對方民心、打擊對方士氣，旨在通過長時期的消耗拖垮對方。像 1994 年開始的波黑戰爭，北約部隊的空中打擊先後持續了一年多，迫使波黑塞族軍隊接受其停火安排。1993 年美國及其盟國對伊拉克持續八、九年的“沙漠之狐”行動、1999 年的科索沃戰爭也屬於這種類型。

— “手術式” 打擊。即在不“吆喝”也沒有任何明顯徵兆的情況下，以精悍的空中、海上打擊力量，對中小國家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目標實施遠程奔襲式突擊，“打一下”或者“抓一把”就走。像 1980 年美國對伊朗實施的“鷹爪行動”、1981 年以色列空襲伊拉克核反應堆、1986 年美國空襲利比亞就屬於這一類。今後，隨著空天一體化的發展、全球兩小時內到達的超高速飛行器的出現，運用這種戰爭形式的頻率將大為增加。

— “抓捕式” 打擊。即大國以精悍的力量，突然、隱蔽地突入對方腹地，通過抓捕對方首腦、癱瘓對方政府機構，迫使對方武裝力量繳械，達成一定的政治目的。1983 年美國入侵格林納達、1989 年美國入侵巴拿馬，都屬於這種類型的戰爭行動。

### （三）國家與非國家組織之間的戰爭

主要指主權國家與非國家形式的反政府組織、政治集團、恐怖組織之間的戰爭或武裝衝突。20 世紀 80 年代，這種形式就已出現。隨著非國家組織的不斷增多，以及非國家組織與國家之間矛盾的不斷擴大，國家與非國家組織之間的戰爭將較為常見。

— 正規“進攻式” 打擊。即像正規戰爭一樣，以較大規模的國家武裝力量對打擊目標實施正規攻擊。像 1982 年以色列出動陸

海空軍十萬多人，對黎巴嫩境內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游擊隊的大規模進攻就屬於這一類。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武裝的軍事打擊也屬於這一類。還有，2007~2008年初土耳其國防軍對伊拉克境內庫爾德武裝的打擊，也是這種情況。

—“清剿式”打擊。即以消滅反政府組織、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為目的，動用一定規模的國家武裝力量對其進行清剿式打擊。像阿富汗戰爭，俄羅斯1994年、1999~2002年的兩次車臣戰爭，就屬於這一類型。

—“特種攻擊式”打擊。比如以解救人質為目的，動用精悍的特種作戰力量對非國家組織實施打擊。像俄羅斯1995年的布瓊諾夫斯克人質解救行動、1996年的基茲利亞爾人質解救行動、2002年的莫斯科人質解救行動、2004年的別斯蘭人質解救行動等，都屬於這一類型。再比如，對國際恐怖組織的特種核打擊。雖然，目前這種樣式還沒有出現，但美國已經預有這方面的準備，而且也有這方面的能力。

從上述三種情況看，雖然戰爭和武裝衝突的規模縮小了、方式多樣了，但政治性、暴力性、對抗性的本質屬性並沒有改變，而且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精確性越來越大，非對稱、非線式、非接觸的景況越來越明顯，“政治軍事仗”的情況越來越突出

#### （四）非戰爭軍事行動

在戰爭威脅日益減少、戰爭規模日趨縮小的同時，非戰爭軍事行動卻大為增加。就全球範圍而言，國際維和、聯合國觀察、國際救援、聯合軍演等已經成為十分搶眼的軍事場景。

就我國而言，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僅參與國際維和的兵力就近萬人，先後在非洲、巴爾干、中東、南亞等地執行任務。聯合軍演既有“上合組織”在中亞地區的軍演，也有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家在海上的軍演。僅2007年下半年，我們的兩支艦艇編隊就在三大洋與有關國家舉行了十次海上聯合軍

演。另外，從 2003 年起，中國軍隊已經先後 14 次對印尼、索馬里、巴基斯坦等 16 個受災國實施了緊急救助行動。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聯合國功能的不斷增大、“大國政治”的日益凸顯，全球範圍內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將會越來越多。

除此之外，隨著我國海外利益的不斷拓展，企業、公民、僑民遭受侵害的情況也日益增多，如何維護國家海外利益尤其是海外企業、公民、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已經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海外武裝力量使用已經歷史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比如：中亞方向的聯合反恐，朝鮮半島一旦發生危機時的越境封控，中南方向的境外維穩，霍爾木茲海峽的聯合保交，中東和非洲等方向的武裝撤出公民和僑民，非洲索馬里海盆聯合反海盜，南美方向聯合反海盜，東南亞和大洋洲方向緊急救助，南北兩極科考護衛，等等。上述情況，都將是我們可能面對的問題。

雖然，非戰爭軍事行動有一些並不屬於戰爭的範疇，但由於需要動用國家武裝力量，而且行動的突然性強、投送的距離遠、指揮和保障對象分散，它除了少有暴力之外，其他方面均不亞於戰爭。尤其是它廣泛涉及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關係、國家形象等諸多方面，影響甚大。因此，已經成為各大國和一些大量承擔國際軍事事務國家的重要研究課題。我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有條件也必須更多地承擔非戰爭軍事行動一類的國際事務。從一定意義上講，非戰爭軍事行動雖然不是戰爭，但它依然是政治的繼續。因此，必須從“講政治”的高度來認真對待。當然，對於主權國家的軍隊來說，最根本的任務依然是抵禦侵略、打贏戰爭！

## 幾點思考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我們正處在千古變局之中。有許多問

題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

第一，對“多種安全威脅”、“多樣化軍事任務”的理解。我理解，胡錦濤主席所提出的“多種安全威脅”、“多樣化軍事任務”，實質上是對“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歷史使命的進一步詮釋，是從國家安全形勢出發、從國家利益出發、從國家武裝力量建設的長遠發展出發，實現“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為“養兵千日，用兵千日”戰略轉變的重要舉措。中國自古就是世界上自然災害的多發地。據聯合國減災科技委的統計：三百年來，全球一次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的50起自然災害中中國佔了26起，死亡人數總計達1.03億，佔全部死亡人數的68%。有數據統計，僅2005年一年，我國就發生了各類公共安全方面的突發事件540萬起，造成死亡20萬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有國家武裝力量參與搶險救災的。可以說，搶險救災、維護穩定是國家武裝力量經常性的任務。一個時期以來，1998年“抗洪”、2003年“抗非典”、2008年“抗冰雪”和“抗地震”，以及海外非戰爭軍事行動，不僅有利地維護了國家利益，而且也極大地促進了國家武裝力量的建設。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已經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普遍做法。比如，美國提出“作戰與重建”並重，並開始在非洲、中東等地區做群眾工作。再如，瑞典、新西蘭等一些小國，每年有近一半以上的軍人在海外執行國際任務，即鍛煉了部隊，又省了軍費。如果說對於“多種安全威脅”我們還比較陌生的話，那麼，“多樣化軍事任務”則是我們的傳統。歷史上，我軍基本任務就是“三隊”——戰鬥隊、宣傳隊（工作隊）、生產隊。當然，今天的“多樣化軍事任務”絕不是歷史上“三隊”任務的簡單回歸！

第二，為什麼說“大戰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我認為，起碼有三點理由：一是由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所決定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尤其是各大國的聯繫十分緊密，生產資料、產品市場相互交融，一損俱

損、一榮俱榮。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有錢，基本上就能夠買到任何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只要有產品也能夠在世界任何角落開闢市場，經濟手段遠比戰爭手段來得容易，沒有非要進行戰爭不可的必要。同時，戰爭耗費鉅大、毀傷嚴重，打一場戰爭就等於自殘一次，打一場大戰就等一次自殺。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今天的國際舞臺，為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發泄、吵架提供了諸多平臺，比如聯合國、世貿組織、衛生組織等，有氣可以泄、有火可以發、有不平也有人為你說理。同時，政黨政治、民主選舉使世界各國領袖的個人權力受到極大的制約，發動戰爭已經不可能再是一個人的理想追求、心血來潮，各國政治家尤其是大國領袖越來越“有文化”、越來越有理智。三是人類發展的客觀需要。一方面，發展是硬道理，經濟的發展才是最根本的發展，戰爭手段奪取的財富只是暫時的、短命的。一方面，“地球村”所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比如環境問題、氣候變暖問題、貧困問題、頻繁發生的大規模自然災害等等，已經讓全球不能不引起廣泛重視。人類真正的敵人是自然界，而不是人類自己。人類只有攜起手來，才能戰勝共同的敵人。當然，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也是重要原因。1970年，毛澤東就曾講過：大國之間的戰爭包括世界大戰雖然都是可能的，但因為有了原子彈，“大家都不敢下手”。

第三，既然沒有大戰威脅，為什麼還要大力發展軍力呢？應當肯定地說，沒有大戰的威脅並不等於沒有威脅。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雖然沒有了“大灰狼”敲門式、“黃世仁搶喜兒”的安全威脅，但我們還面臨著“大灰狼”、“小狼崽子”滿世界禍害我們的問題，面臨著“楊白勞要債難”的威脅。我們有那麼多海外投資，有那麼多外國國債，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到時候恐怕連自己的債權都維護不了！

不想打仗的軍人不是一個好軍人，就像不想和平的政治家一樣，是一種恥辱。問題是，要發展軍力，不能總拿戰爭威脅說事。



實事求是是我們的基本思想路線。自古以來，“富國”與“強兵”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生生不息、不斷傳承的根本。這是人類歷史的鐵律。同時，在新形勢、新條件下，拉動軍事力量建設也有十分充足的現實理由。

首先，是大國崛起的需要。我們講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要實現“和平崛起”，這裡面有一個如何看待“和平”的問題，即“和平”到底是什麼？我認為，和平只是一種手段、一種發展壯大、實現崛起的有利條件，而崛起——發展壯大、富國強兵才是目的！因此，對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強大的軍事實力“有就是力量，存在就是價值”。如果說外交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聯繫世界的臂膀，那麼，軍事實力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屹立於世界的脊梁！支撐大國地位的主要因素雖然包括經濟、科技等，但最主要的依然是軍事。否則，經濟、科技再發達，充其量你也就是一頭大肥豬！

其次，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需要。我們講“創建和諧世界”，“和諧”是“治”的結果，不是無序的必然。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即由誰來治理世界？如何維護和平？霸權要不得，但承擔國際責任絕不是霸權。全球化、多極化對維護和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自古講“能戰方能言和”，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就沒有真正意義上平等、有尊嚴的外交，維護和平也是一句空話。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多極化所帶來的不穩定和不安寧也是一種必然。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不要說維護和平、創建和諧世界，就是在多極化世界格局中也不會擁有應有的位置。

再次，是“為世界做更大的貢獻”的需要。毛澤東早就強調指出，中國人民應當為世界做更大的貢獻。全球經濟必然要求全球管理，中國是全球化的生力軍，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今天的中國要參與“管理世界、修理地球”，就必須首先“強身健體”。“打鐵還要自身硬”！

古今中外，“威脅牽引”是拉動軍事建設的一種普遍做法，有事兒沒事兒都說“狼來了”。實踐證明，這種“情況刺激”的方法有效但沒有長效、有利但弊遠大於利。因此，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要“從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的高度，……實現富國與強軍的統一”。確立適應新情況的“基於需求”的戰略思維，即使沒有“大灰狼”來敲門，我們也要努力修好自己的“牆”，用強大的軍事實力支撐國家崛起、支持國際關係政策、支起強國的身軀！

第四，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國家的戰略任務主要是什麼？國家戰略任務，源於國家利益的需求。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最大的國家利益是實現崛起。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與世界各國政治上相互尊重，經濟上相互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鑒，安全上相互信任，環保上相互幫助，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最主要的是軍事力量的支撐，否則就沒有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環保等領域平等協商的資格。

著眼於支撐國家崛起，胡錦濤總書記先後提出了“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歷史使命，“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等一些基本任務。簡要概括一下，就是在鞏固執政地位、穩定國內的基礎上，努力解決六個問題：“一臺”（祖國統一問題）；“一圈”（周邊2.2萬公里邊境線、1.8萬公里海岸線）；“三海”（黃海、東海、南海主權和權益問題）；“兩洋”（太平洋、印度洋戰略通道安全問題）；“四區”（非洲、中東、中亞、南美四個重要生產資料來源地、產品市場的安全問題）；“一太空”（太空安全問題）等。總之，為了確保實現崛起，我們應當緊密圍繞十七大報告提出的發展目標，堅決貫徹和平崛起這一基本政策，努力實現統一，穩定周邊，解決“三海”，經略“兩洋”，預置“四區”，拓展太空。

當然，戰略任務是長期的、全局的、宏觀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需要各條戰線、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各軍種、各佔區深化、細化、具體化。